市场与政府视角下非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分异

——基于长江经济带县域实证研究

张坤莲[1,2]，刘 睿[1,2,3]

（1. 重庆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重庆 401331；2. 重庆师范大学地理信息系统应用研究重庆市高校重点实验室，重庆 401331；3. 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中心，北京 100101）

摘要：聚焦长江经济带县域非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空间分异问题，基于“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协同理论构建“政府供给水平-市场响应强度”分析框架，通过基尼系数模型、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MGWR）等方法，测度县域非基本公共服务空间格局，以“政府-市场”视角深入揭示其多尺度空间分异特征与驱动因素。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非基本公共服务呈现“政府托底保障为基础、市场驱动高值为散点”的分布特征，整体形成“东高西低”的梯度格局；省域内部均衡性表现为自下游向上游的递减趋势，反映出不同区域政府与市场协同效能的显著差异；多数城市群存在低水平县域依赖政府供给、高水平县域依靠市场驱动的结构性矛盾；各驱动因素均呈现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其作用强度与方向随区域动态变化。研究成果为理解县域非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中政府与市场的协同机制提供了理论参考，也可为推进区域公共服务一体化与精准化治理提供实证依据。

关键词：非基本公共服务；政府-市场协同；空间分异；长江经济带

中图分类号：F061.5；D0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807(2026)07－0203－09

公共服务关乎民生民心。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非基本公共服务重要性凸显。依据《“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非基本公共服务是为满足公民更高层次需求、保障社会整体福利水平所必需，但市场不能自发提供的服务，其供给核心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其中，面向特定群体、市场供给不足的领域（如部分养老、托育、医疗服务），被界定为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强调由政府引导支持、市场主体运作，提供价格可承受、质量有保障的普惠性服务。这要求在基本公共服务由政府保障可及性的基础上，对非基本公共服务（特别是普惠性部分），既要发挥政府引导作用，保障其普惠可及，更要依靠市场主体提升供给效率[1-2]，最终实现“普惠”与“效率”的有机统一。

在当前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深化改革的背景下，传统的政府单一供给模式已难以适应发展需求，存在服务效率低、资源错配等“失灵”现象[3]。为破解这一困局，“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协同理论提供了一个具有指导意义的分析框架，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积极发挥政府在制度供给和风险防控方面的作用[4-5]。有效市场通过价格机制与要素流动优化资源配置[6-7]，而有为政府通过制度供给与风险防控弥补市场不足[8-9]，二者相辅相成、动态互补，共同构成公共服务提质增效的系统性支撑。

长江经济带作为横贯中国东中西3大区域的重大国家战略发展区域，其内部县域单元的发展极具代表性。这些县域既承载着连接城乡、落实国家战略的重要功能，也承受着要素集聚与政府治理能力的双重影响。尽管该区域具有推进非基本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显著优势，但也面临核心城市“虹吸”、县域“空心化”加剧、人口流动加剧、供需错配加剧等现实挑战[10-11]。因此，从“政府-市场”协同的视角，深入剖析长江经济带县域非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空间分异格局与驱动因素，不仅是对既有理论的有效性检验，更是破解区域协调发展难题、回应

收稿日期：2025-10-16

基金项目：重庆市教委科学技术研究重大项目（KJZD-M202200502）；重庆市自然科学基金创新发展联合基金（CSTB2024NSCQ-LZX0064）

作者简介：张坤莲（1999—），女，四川宜宾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大数据应用与区域发展；通信作者刘睿（1983—），男，重庆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大数据应用与区域可持续发展。

特定地域民生关切的迫切需求。

鉴于此，选取民生关联度高、市场化特征显著、县域数据丰富的医疗、养老、托育3类服务作为非基本公共服务的典型代表，构建“政府供给能力”与“市场需求响应强度”的双维分析框架，旨在精准刻画长江经济带县域非基本公共服务中政府与市场的协同效能，以期为推动区域公共服务一体化与政策精准化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依据。

1 文献综述

1.1 非基本公共服务的研究现状

非基本公共服务是公共服务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解决市场自发供给不足的问题[12]。随着“老龄化”“少子化”趋势加剧以及民众需求层次的提升，非基本公共服务的发展路径与供给模式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13-14]。

现有研究围绕非基本公共服务主要展开了以下两方面的探讨：①改革困境与路径选择，学者们分析了当前存在的政府介入过多、市场化程度不足等矛盾，并探讨了多元化供给的发展路径[3,15]。这些研究较好地揭示了制度性障碍，但缺乏大样本的实证检验，尤其难以解释同一政策在不同区域为何出现显著异质性效果。②宏观理论与政策研究。大量成果偏重于理论构建与政策分析，强调了市场化改革对于缓解财政压力、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的积极作用[16-17]。然而其分析单元多以全国或省级层面为主，政策建议往往较为宏观，难以精准对接县域等微观治理单元的实际需求。同时，现有研究对象更多聚焦于基本公共服务，对其配置优化、可达性、供给效率等已有大量研究[17-19]，但对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的专门性、系统性实证研究相对薄弱，对非基本公共服务多元供给主体的交互机制及其空间效应的实证研究尚显不足[20]。

1.2 “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协同理论及其在公共服务中的应用

“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协同理论是阐释中国经济发展与治理效能的重要分析框架。该理论认为，“有效市场”通过价格机制与自由竞争，能够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而“有为政府”则通过制度供给、战略规划与监管，弥补市场失灵，维护公平竞争环境，二者互为补充[21-22]，形成“放得活”又“管得住”的良性互动[23]。这一思想可追溯至Savas[24]提出的公共服务市场化理论，其核心在于推动政府从“划船者”向“掌舵者”的角色转变，为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合作（如PPP模式）提供了理论基础[25-26]。其理念在中国政策语境中进一步体现为对“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关系的重视，为非基本公共服务实现普惠与效率的统一提供根本遵循。

国内学者在此框架下深入探讨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区域异质性。宋金波等[27]指出，政府与市场的平衡至关重要，政府投资可缩小服务差距，但过度介入会抑制社会资本活力。在市场发育不足地区，片面推进市场化易产生“挤出效应”。相关实证研究多采用双重差分、组态分析等方法，证实发现东部地区往往更易形成市场主导模式，而中西部地区则需要政府更积极地培育市场[28-29]。

基于上述理论演进与实证发现，将“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协同机制操作化为两个可测度的核心维度：①反映政府托底与引导能力的“政府供给能力”；②体现市场活力与响应程度的“市场需求响应强度”。二者间的交互强度与空间格局共同影响非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实际效能。

2 研究区概况、研究数据与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长江经济带横跨中国东中西部，是连接沿海与内陆的关键经济走廊。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11个省份。该区域以占全国21.4%的国土面积，贡献了46.7%的经济总量，是中国长期的经济建设主战场和绿色发展核心区[27]，也是城市群、产业和增长高度集聚的区域，综合实力和战略地位突出。其医养托育等服务资源丰富且具有代表性，县域研究可为促进区域协调与高质量增长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2.2 研究数据

以长江经济带各县域为基本研究单元，依据《“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的政策分类、公共产品属性分层理论的可市场化特征，以医疗、养老、托幼3类具有显著市场化特征的非基本公共服务为代表，整合1 445 677条POI（信息点）数据及工商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其中少量缺失数据（总体缺失率<5%）具有区域同质性，接近于随机缺失，采用以县域为单元的同类设施均值进行填补]。研究聚焦于长江经济带这一重要经济区域，涵盖其内部多个省份的行政区划数据。人口数据源自WorldPop高精度人口空间分布格网数据集。数据类型及来源见表1。

2.3 研究方法

2.3.1 政府供给-市场响应二维评价指标体系

“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协同理论的核心在于，

表 1　数据类型及来源

数据名称	数据来源	数据类型	时间
信息点(POI)	高德地图	矢量	2023 年
人口数据	WorldPop	栅格	2020 年
行政区划	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中心	矢量	2023 年
注册资本	天眼查	数值	2023 年

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各自发挥比较优势,形成互补。通过“政府供给水平”量化“有为政府”的托底保障职能,以基础服务网络的覆盖广度与公平性,确保服务的可及性底线。“市场响应强度”则旨在测度“有效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通过市场主体的活跃度、业态多样性及在供给中的占比,反映市场机制对服务需求的识别与响应能力,以提升供给效率与品质。两个维度的协同与分异,是测度县域非基本公共服务中“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协同效能的直接体现。

(1)政府供给水平(P):服务设施覆盖程度是衡量服务空间可达性与公平性的关键指标,直观反映政府基础服务网络铺设成效。为量化政府对非基本公共服务发展的引导效能,以托育、养老、医疗等 POI 数据为基础,结合注册资本确定服务设施的缓冲区半径,以此标识高可达区域。借助 WorldPop 人口数据,可便捷获取服务的人口比例,从而量化政府基础服务网络的覆盖效能与空间公平性。

$$R_i = k\sqrt{\text{注册资本}_i} \tag{1}$$

$$\text{服务人口覆盖率} = \frac{\sum_i \text{服务范围内实际人口数量}_i}{\text{总人口数量}} \tag{2}$$

式中:R_i 为服务设施的缓冲区半径;k 为比例系数。

(2)市场响应强度(M):服务设施聚集密度和市场经营主体在服务供给中的占比,能体现市场活跃度与业态多样性,反映市场对不同服务需求的响应程度。通过注册审批机关区分政府与市场两类服务主体,并基于 POI 密度和市场主体在服务中的占比,评估市场在非基本公共服务中的活跃程度、业态多样性及需求响应能力。

(3)熵值法。采用熵值法对上述各类服务的空间覆盖率与市场响应指标进行客观赋权,以克服主观偏差并处理多指标信息重叠问题,最终集成政府供给与市场响应的综合评价值。结果(表 2、表 3)显示,养老服务相关指标被赋予较高权重,这客观反映了其数据在县域间差异显著;相比之下,医疗与托育服务指标的权重较低,表明其数据在空间分布

表 2　非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度指标权重

指标类型	指标分类	信息熵值 e	信息效用值 d	权重 w/%
医疗服务	政府医疗	0.827 5	0.172 5	12.78
	市场医疗	0.733 9	0.266 1	19.71
养老服务	政府养老	0.626 5	0.373 5	27.67
	市场养老	0.707 7	0.292 3	21.65
托幼服务	政府托幼	0.887 5	0.112 5	8.33
	市场托幼	0.866 9	0.133 1	9.86

表 3　市场响应强度权重

指标	信息熵值 e	信息效用值 d	权重 w/%
市场医疗占比	0.998 1	0.001 9	4.03
市场养老占比	0.961 1	0.038 9	82.84
市场托幼占比	0.993 8	0.006 2	13.13

上更为均衡。该特征与“养老服务市场发展水平区域分化大,而医疗与托育服务市场参与模式空间同质性较高”的现实观察相符。

2.3.2　象限图法

为识别各县域在发展模式中的优势与不足,基于政府供给水平(P)与市场响应强度(M)两个维度的得分,利用象限图实现数据到类型的转化。以全部样本的中位数作为分割基准,将县域划分为 4 种协同模式(图 1)。第Ⅰ象限(高-高型):高供给水平-高市场响应,为综合发展型;第Ⅱ象限(低-高型):低供给水平-高市场响应,为市场主导型;第Ⅲ象限(低-低型):低供给水平-低市场响应,为基础发展型;第Ⅳ象限(高-低型):高供给水平-低市场响应,为政府主导型。稳健性检验(K-means 聚类)证实,中位数象限法“高值县域核心集聚、低值县域广泛分布”的核心空间结论稳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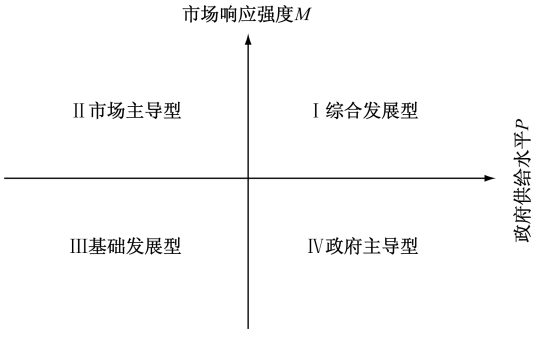


图 1　非基本公共服务市场化评价象限图

2.3.3　供给均衡性基尼系数模型

为量化政府供给与市场响应在空间配置上的匹配度,对经典基尼系数模型进行了适应性应用。将县域按政府供给水平从低到高排序,计算其对应的市场响应强度累积百分比,并绘制洛伦兹曲线(图 2)。通过计算曲线与绝对平等线(对角线)的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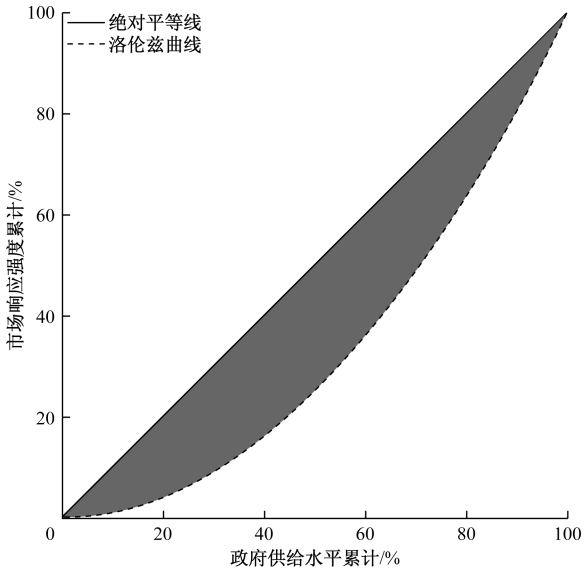


图 2　供给均衡性基尼系数模型的洛伦兹曲线示意图

积比例，得到衡量二者空间均衡性的基尼系数。该系数越接近 0，表明政府与市场力量的协同性越好、空间配置越均衡；反之，则表明空间错配越严重。

2.3.4　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MGWR）模型

为探究各影响因素对非基本公共服务协同效用的作用与空间异质性，采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multiscale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MGWR）模型进行分析。该模型允许每个自变量拥有不同的空间带宽，从而能更精确地揭示各驱动因子在不同地域的作用规律。

3　结果与分析

3.1　长江经济带县域非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分异特征

3.1.1　县域非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整体空间格局

基于县域单元的分析显示，长江经济带非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呈现如下空间分布模式：①县域结构呈现基底式分布，以低市场响应县域为主体广泛分布，较高及高市场响应区域呈岛状嵌于其中。反映了该区域整体非基本公共服务市场化仍处于初级阶段。②县域水平梯度遵循“东高西低”分异。较高市场响应区域集中于下游的江苏、浙江和上海。而中上游的湖北、四川和云南等地县域则以中低水平为主。③县域空间关联辐射效应显著。高市场响应县域呈“点-轴”式分布。成渝双核驱动西部地区，武汉支撑中游发展，南京、杭州和上海等核心城市及其周边县域构成“高值三角区”，并沿长江干流以及主要支流向外延伸，形成“点-轴”拓展态势，如成都周边、长三角地区内部，出现了高水平县域相互连接形成的“连绵区”，体现了核心城市对周边县域的扩散效应。市场响应强度与政府供给水平二维散点图如图 3 所示，长江经济带非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发展分区如图 4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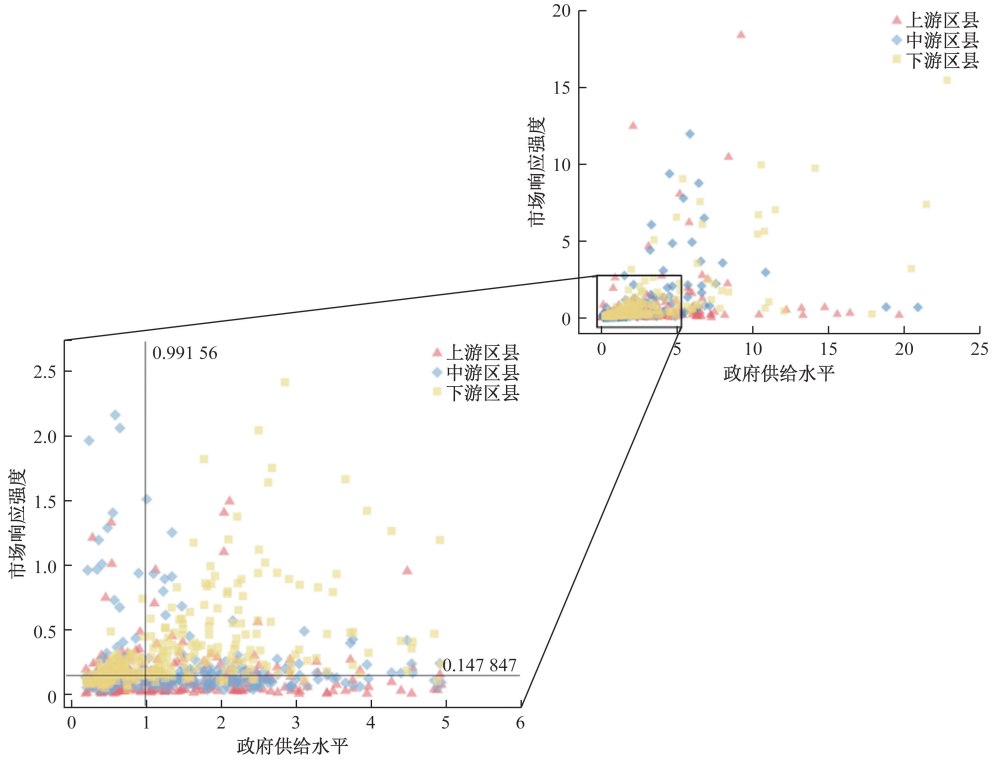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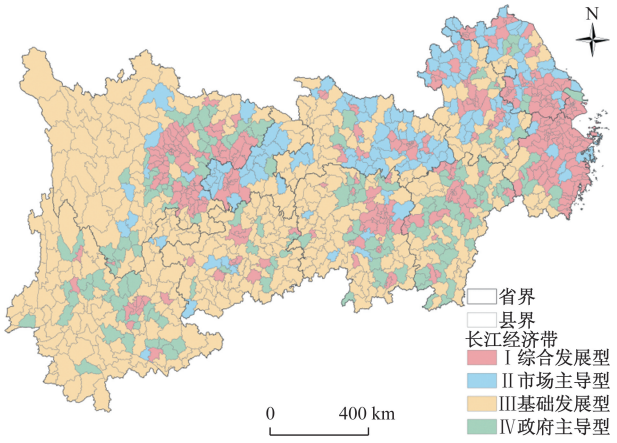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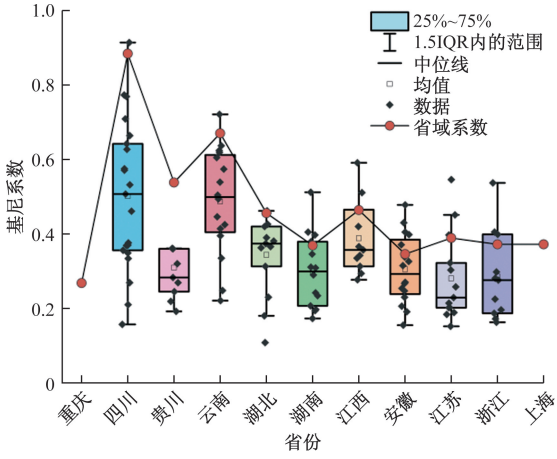


图 3　市场响应强度与政府供给水平二维散点图



审图号:GS(2023)2767 号

图 4　长江经济带非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发展分区



IQR 为四分位数间距

图 5　省域基尼系数适应性改进模型箱型折线分析

3.1.2　省域尺度下县域供给水平差异格局

为揭示省域尺度下县域单元非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差异结构,基于县域数据绘制洛伦兹曲线并计算供给均衡基尼系数,结合箱形图(图 5)、进行多尺度解析。结果显示,各省内部县域间的供给水平分布存在显著的梯度差异与空间联动特征:①从省域内部差异看,县域非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均衡度呈“下游>中游>上游”梯度特征。上游省份内部县域间的均衡性差异最为突出,其中重庆市内县域差距较小(基尼系数为 0.269),而四川与云南省内县域的供给水平分布不均衡(基尼系数分别达 0.885 与 0.671),反映出偏远与核心县域存在较大的发展鸿沟;中游地区,湖北与江西省内县域的差异程度相近且高于湖南,表明鄂赣两省资源向中心城区县域集聚,导致省内协同发展不足;下游省份内部县域间的供给最为均衡,江浙两省基尼系数稳定在 0.3~0.4,体现了长三角一体化进程对缩小县域差距的积极作用。②从地级市内部差异看,县域“均衡与极化”并存。上游的四川与云南其地级市内部的县域间差距较大[IQR(interquartile range,四分位数间距)范围宽],部分地区系数达 0.7,表明城市核心县域与周边县域发展断层,城市区域协调不足;贵州则表现为“低水平均衡”,即县域间差异虽小,但整体供给不足。中下游地区地级市内部县域相对均衡,但省会城市表现出明显的极化特征,南京与杭州的基尼系数分别为 0.547 与 0.538,这意味着核心城区服务供给远超辖区内其他郊区与县域,揭示了政策虹吸与资源集中的现象。

3.1.3　城市群内部县域供给水平的差异格局

不同城市群的洛伦兹曲线形态与基尼系数差异,直观反映了其内部县域单元供给水平分布的不均衡程度。图 6 显示,长三角城市群基尼系数最低(0.39),其洛伦兹曲线贴近对角线,表明其内部县域间的供给水平差异相对最小。这种高度均衡性得益于平原地理、密集交通网络与多中心产业协同(如上海与苏州、杭州的区域互补),推动政府供给与市场响应在广大县域范围内的高效匹配。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成渝城市群,基尼系数高达 0.64,洛伦兹曲线显著下凹。这揭示了其内部县域供给水平存在较为严重的失衡,外围城市资源分配与非基本公共服务产业外溢不足,呈现出典型的“双核极化”效应。滇中、黔中与中部城市群曲线下凹程度介于两者之间(基尼系数为 0.55~0.57)。这表明这些城市群内部仍有资源向核心县域集聚现象,尽管城市发展差异略小于成渝城市群,但受山地地理分散、产业链整合不足等制约,仍未形成全域均衡发展态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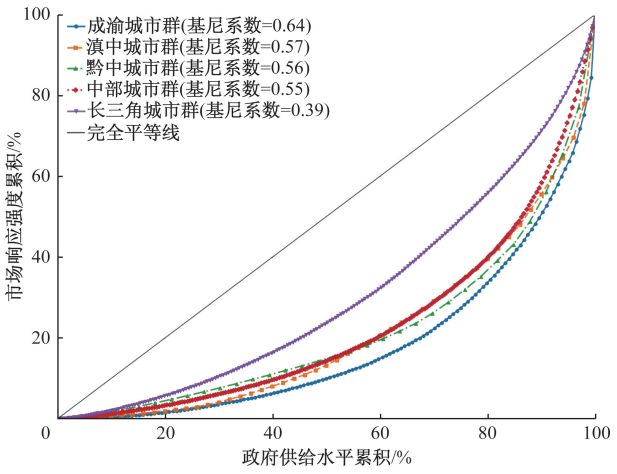


图 6　5 大城市群指标分布洛伦兹曲线对比

所有城市群洛伦兹曲线的形态分析进一步揭示了一个共性结构特征：曲线前中段（对应占比60%的县域）平缓上升，后段（对应占比40%的县域）则急剧抬升。这一致性地表明，在各城市群中，半数以上的县域处于低供给水平区间，其服务供给主要由政府主导，市场响应薄弱；而高水平供给则高度集中在少数核心及发达县域，呈现出“整体广域覆盖、高水平服务高度集中”的县域分布模式。

3.2　驱动因素分析

3.2.1　共线性检验与模型选择

为系统解析非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空间分异机制，基于“政府-市场”协同理论，构建了一个涵盖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政府能力与人口结构的驱动因素分析框架。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是市场需求的基石，能体现地区经济成果和居民消费能力；产业结构（第三产业占比）反映了服务经济的发育程度，与非基本公共服务业态密切相关；政府能力（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直接决定了政府供给与引导的财力基础；人口结构（城镇化率、年龄结构）则塑造了潜在的服务需求格局。这4类因素共同构成了解析非基本公共服务空间分异的综合框架。

在方法上，采用逐步回归策略以确立核心驱动因素并验证其独立性。首先利用最小二乘法OLS模型初步估计，并通过方差膨胀因子（VIF）进行共线性诊断。表4显示，所有解释变量的VIF均小于10，解释变量间线性相关弱，无严重共线性，即它们从不同角度对非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产生相对独立的驱动作用。进而，为研究驱动力的空间异质性，引入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和多层次地理加权回归模型（MGWR）进行对比。从表5可知，MGWR模型拟合效果明显优于GWR与OLS，其多层次特性使较高的adj.R^2带来更好拟合效果，未过度拟合。因此，采用MGWR模型的结果进行驱动机制解析，能够更精确地揭示“政府-市场”协同关系在空间上的具体作用模式。

表4　解释变量选取与共线性检验结果

特征类型	解释变量	变量描述	VIF
经济发展	人均GDP	地区GDP/地区常住人口	1.549 382
产业结构	第三产业占比	第三产业增加值/地区GDP	1.012 567
政府投入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地区政府的投入能力和财政状况	1.471 760
人口结构	城镇化率	城镇人口/地区人口	1.611 549
	年龄结构	15岁以下人口/地区常住人口	1.437 371

表5　MGWR与GWR、OLS模型比较

变量	OLS	GWR	MGWR
R^2	0.346 7	0.520 8	0.732
adj.R^2	0.343 6	0.499 4	0.6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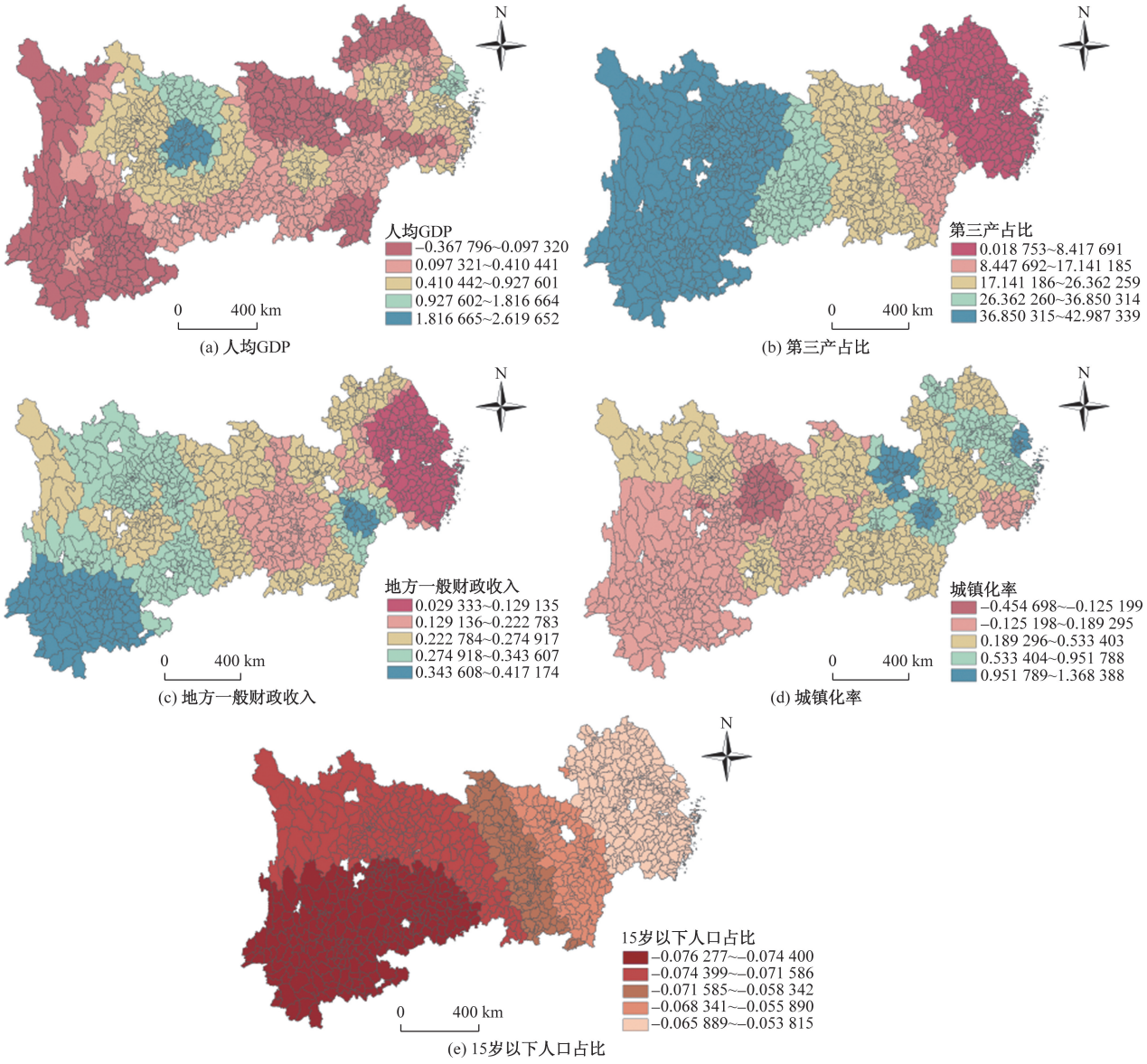
3.2.2　基于MGWR模型的驱动因素空间异质性分析

（1）经济发展基础（人均GDP）驱动作用呈现“核心-边缘”三级梯度分异[图7(a)]。上游成渝地区呈现极化效应：成渝地区人均GDP驱动系数较高，重庆地区最高并逐级递减；边缘区域如川西、黔南和云南大部则为负向影响。中游地区湖南与江西北部驱动作用显著，反映中部崛起战略成效。而武汉虽人均GDP水平较高，因其国有企业占比较高、市场竞争活力不足等环境因素，呈现负向驱动。下游以上海、苏州地区以及安徽中部为高值区，体现了“高收入-高服务需求”的规律。周边地区因产业外溢效应驱动作用相对较弱。

（2）产业结构（第三产占比）的驱动作用总体呈现自西向东逐级递减趋势[图7(b)]，在长三角、安徽、江苏北部和浙江南部地区驱动呈现负向影响。西部地区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供给相对匮乏，第三产业在地区GDP中占比的提升，伴随着外部资金、技术、人才的流入，催化产业融合与服务市场化，如丽江旅游业带动服务供给提升。相反，下游地区第三产业占比较高、非基本公共服务市场趋近饱和，易出现如上海金融业过度集聚挤压民生服务等“鲍莫尔病”现象。

（3）政府财政能力（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作用，呈现出从“市场补位”到“市场引导”的动态转换[图7(c)]。在市场发育不足的云南、川西等地，政府财力是弥补服务短板的关键力量，呈现正向驱动；而成渝及沿海地区市场机制相对成熟，现有服务相对饱和，财政资源更多投向基建等其他领域。加之市场竞争激烈，财政干预反而可能抑制市场化进程。

（4）城镇化进程与人口结构共同塑造了潜在的服务需求格局。城镇化率在长三角、鄂东等地呈强正向驱动，反映了人口集聚对服务市场的自然促进作用[图7(d)]，但重庆与川东北地区因城镇化以“土地扩张”和“人口转移”为主导，产业发展与服务现代化不同步，城乡二元结构明显，服务市场发育滞后，呈现负向影响。与此同时，以15



审图号:GS(2023)2767 号

图 7　驱动因素差异分析结果

岁以下人口占比衡量的抚养负担,是抑制非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关键因素,影响自上游向下游渐弱,云贵地区受影响显著[图 7(e)]。其内在机制在于,较高的抚养负担会挤占家庭的可支配收入,迫使消费向基础教育、基本医疗等保障性领域倾斜,从而抑制了非基本公共服务的市场化空间。然而,这种抑制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在欠发达地区,抚养压力确实强化了家庭的生存型消费模式,制约了市场化服务的发展;但在经济发达地区,较高的居民支付能力与市场需求,却能将其转化为推动服务升级的动力(如托育服务转型、素质教育等),进而形成吸引人才、缓解结构性压力的良性循环。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在市场与政府视角下,长江经济带非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整体呈现多维空间分异特征。

(1)全域呈现出“政府保障托底、市场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格局。政府供给形成了广域覆盖的“基底”,保障了服务的可及性底线;而高水平供给则主要由市场响应驱动,表现为在长三角、成渝等核心城市周边县域形成的“高值散点”。这种格局与理论中强调的政府托底职能与制度供给角色高度吻合,印证了政府向“掌舵者”转型的现实必要性,即政府通过构建基础服务保障公平,进而为市场机制释放效率提升空间。

(2)省域均衡性的“下游>中游>上游”梯度分异,深刻反映了区域异质性背景下“政府-市场”协同能力的差异:下游地区的高度均衡,印证了其在成熟市场经济与高水平区域一体化政策支持下,实现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高水平动态平衡;中游地区“中心-外围”的显著落差,揭示了在资源集聚阶段,政府调控与市场力量未能有效惠及外围县域,表明协同机制在空间传导上存在阻滞;而上游地区普遍的发展断层则说明,在市场原生动力不足的背景下,单一的政府投入难以激活有效市场,凸显了在上游地区强化政府引导角色的必要性。

(3)城市群内部发展的不均衡,揭示了“政府-市场”关系的不同阶段:除长三角外,多数城市群呈现出“核心区市场主导、外围区政府依赖”的结构性矛盾,说明现有的核心区市场效能向外围县域形成梯度扩散与辐射效应仍不足,协同效应仅局限于局部。

(4)驱动机制异质性明显表明了“政府-市场”的协同需因地制宜:在市场原生动力薄弱区域表现为不可或缺的支撑作用,而在市场机制成熟的发达地区,则可能因过度介入而产生挤出效应;同时,人均GDP的驱动效力在达到一定水平后衰减,说明“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组合策略必须依据当地的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与人口结构等具体情境进行精准调适。这为未来实施差异化的区域公共服务政策提供了直接的理论与实践依据。

4.2 讨论

研究揭示的非基本公共服务的空间分异格局,实质是“政府-市场”在不同地理与制度环境下相互作用的外在表现。未来发展应超越“加大政府投入”与“推进市场化”的二元思维,转向更具适配性与精准度的协同治理体系。为此,须在“区域一体化”与“县域精准化”两个层面寻求平衡:在宏观层面,省级与城市群规划应打破行政壁垒,促进要素自由流动,构建统一开放的区域协同;在微观层面,则应下沉县域单元,根据各地“政府-市场”关系的具体类型与发展阶段,制定差异化的分类指导策略,实现从“一刀切”向“精准施策”的根本转变。

此外,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①时序动态分析不足,仅基于单一时期数据未能反映演变过程;②领域覆盖有限,重点关注医疗、养老、托育等方面,未充分纳入文化、体育、交通等其他非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后续研究可拓展多期对比与多领域分析,以获得更为全面和深入的理解。

参考文献

[1] 储琰,高广智. 非基本公共服务:中国社会工作服务的市场化破局机遇[J]. 社会工作,2023(3):49-62.

[2] 张润君. 公共服务体系现代化:政府、社会和市场[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59(6):204-212.

[3] 王佃利,王文婷. 面向治理现代化的公共服务理论思考:内涵、要求与路径[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60(3):20-31.

[4] 昌敦虎,张泽阳,杨瑄,等. 生态环境空间管控、土地价格与绿色发展:基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准自然实验[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5,42(3):69-90.

[5] 步丹璐,王钰涵. “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政府采购在市场中的稳定作用:基于企业经营风险的视角[J]. 财贸研究,2023,34(6):71-83,110.

[6] 解胜利,吴理财. 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有为政府:基于C县草莓产业发展的长时段考察[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1(6):72-81.

[7] 裴广一,葛晨. 以“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J]. 学习与探索,2023(7):80-89,180.

[8] 唐天伟,吴素婷,江晓婧. 中国城市绿色低碳发展效率的组态分析:基于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协同视角[J]. 改革,2024(10):146-162.

[9] 史敦友,韩立达. 政府与市场协同: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产业高质量发展机制与路径:以四川三州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为例[J]. 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24(5):9-17.

[10] 张华,李鑫. 中国四大城市群人口就业增长与结构的时空格局[J]. 地理学报,2025,80(6):1502-1519.

[11] 刘达,李志刚. 人口回流视角下的县域城镇化模式类型及演进特征:以湖北天沔地区为例[J]. 地理学报,2025,80(10):2708-2719.

[12] 李上. 公共服务标准化体系及评价模型研究[D]. 北京:中国矿业大学(北京),2010.

[13] 夏杰长,王鹏飞. 数字经济赋能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与重点方向[J]. 江西社会科学,2021,41(10):38-47.

[14] 杨菊华. 理论基础、现实依据与改革思路:中国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发展研究[J]. 社会科学,2018(9):89-100.

[15] 高传胜. “十四五”时期推进非基本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研究[J]. 经济研究参考,2021(1):16-30.

[16] 伊文君. 山西非基本公共服务开放发展路径研究[J]. 经济师,2020(1):45-47,50.

[17] 孟巍. PPP模式对我国城镇化影响研究[D]. 北京:中央财经大学,2019.

[18] 陶卓霖,戴特奇,宋长青. 空间公平导向的城市医疗设施优化配置模型研究[J]. 地理学报,2023,78(2):474-489.

[19] 宋正娜,陈雯,张桂香,等. 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可达性及其度量方法[J]. 地理科学进展,2010,29(10):1217-1224.

[20] 卢婷婷,李志远. 居住空间分异对城市公共服务供给的

因果效应研究:以上海市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2023,42(9):1795-1808.
[21] 高培勇,杜创,刘霞辉,等.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一个逻辑框架[J]. 经济研究,2019,54(4):4-17.
[22] 范柏乃,金洁. 公共服务供给对公共服务感知绩效的影响机理:政府形象的中介作用与公众参与的调节效应[J]. 管理世界,2016,32(10):50-61,187-188.
[23] 洪俊杰. 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N]. 光明日报,2025-01-07(11).
[24] SAVAS E S. Privatization and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M]. Thousand Oaks:Sage Publications,2000.
[25] 刘薇. PPP模式理论阐释及其现实例证[J]. 改革,2015(1):78-89.
[26] 杨炼. 从国家本位到市场化:德国公共服务的发展与启示[J].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20,37(6):72-77.
[27] 宋金波,苑贺辉,聂榕. 基本公共服务区域均等化中的"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基于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的证据[J]. 中国管理科学,2025,33(4):95-107.
[28] 王福涛,谢健,熊培志. 知识产权保护如何影响城市创新集聚?兼论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J].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4,45(12):68-87.
[29] 徐亚东,张应良. 城乡要素流动的关键桎梏与实现路径:基于"有效市场-有能集体-有为政府"理论框架[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23,22(5):546-554.
[30] 尹鹏,王富喜,段佩利. 中国基本公共服务效率与城镇化质量的时空耦合关系研究[J]. 地理科学,2021,41(4):571-579.

Differentiation in Non-basic Public Service Supply from Market and Government Perspectives: An Empirical Study of County-level Regions in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ZHANG Kunlian[1,2], LIU Rui[1,2,3]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2. Chongqing Key Laboratory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Application,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3. National Earth System Science Data Center,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The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non-basic public service supply at the county level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was investigated.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government supply level-market response intensity" was developed based on the "effective market-capable government" synergy theory. The Gini coefficient and multiscale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MGWR) were employed to measure the spatial patter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Findings indicate that non-basic public services exhibit an "east-high, west-low" gradient. A foundational government guarantee combines with scattered, market-driven high-value points. Intra-provincial balance decreases from downstream to upstream regions, revealing varying government-market synergy. Most urban agglomerations show a structural split: low-level counties depend on government supply, whereas high-level ones are market-driven. All driving factors demonstrate clear spatial heterogeneity, with intensity and direction varying regionally. Findings provide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understanding government-market collaboration in public service delivery and also offers an empirical basis for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targeted governance.

Keywords: non-basic public services; government-market synergy; spatial heterogeneity;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